



沙博里

# 一个美国人在中国

沙博里

# 一个美国人在 中国

程应瑞等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封面设计：马少展

一个美国人在中国

YIGE MEIGUOREN ZAI ZHONGGUO

沙博里 著

程应瑞 董乐山 傅惟慈 宋 宁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 9 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8.875 印张 135,000 字  
1984 年 10 月第 1 版 198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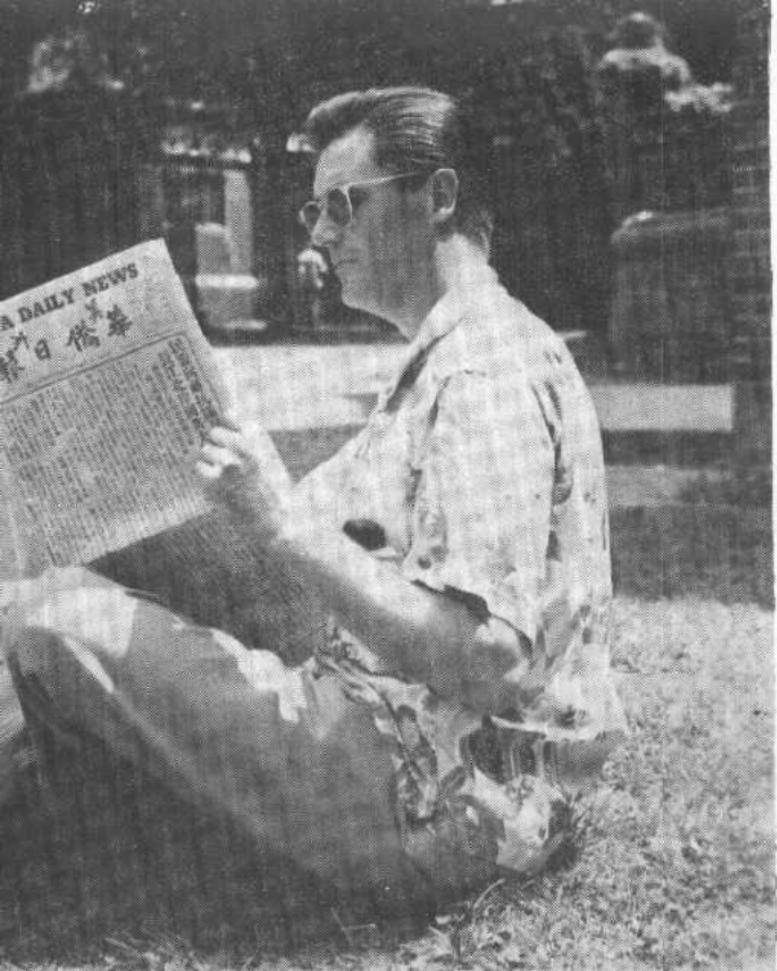
印数 00,001—18,700

书号 11002 · 630 定价 1.10 元



凤子沙博里  
一九五〇年春节在北京

一九四六年  
在耶鲁大学  
校园里



沙博里  
凤子  
一九四八年  
在上海



试试看，你是否能从这本书上得到一些东西。www.tonyl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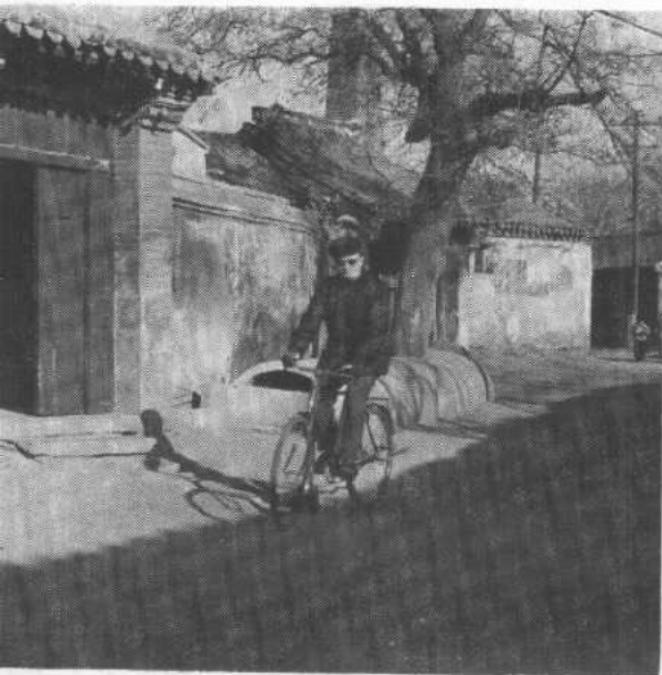
一九六三年妈妈来华时所摄合家欢



一九七〇年  
与爱德加·  
斯诺在北京



在电影《停战以后》中饰演角色



骑自行车回家  
在住宅门前

# 目 录

一	• • • • • • • • • • • •	(1)
二	• • • • • • • • • • • •	(57)
三	• • • • • • • • • • • •	(82)
四	• • • • • • • • • • • •	(120)
五	• • • • • • • • • • • •	(163)
六	• • • • • • • • • • • •	(180)
七	• • • • • • • • • • • •	(189)
八	• • • • • • • • • • • •	(223)
九	• • • • • • • • • • • •	(252)
后记	• • • • • • • • • • • •	(279)

他沿着江岸跑着，黑色的长袍在风中飘动。我靠在从黄浦江上慢慢地驶向上海的货轮的栏杆旁望着他。一个中世纪的和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长袍——中国男人如果穿得起的话都穿的衣服，代替西方的大衣。他不是和尚，但是他给我的中世纪印象是有预兆性的，因为一九四七年四月的中国很象刚刚从黑暗时代跨出来。

我不远万里而来。到底是什么机缘，使得我这个三十二岁的美国人，纽约州律师公会的会员，退伍军人，到这个遥远的海边来呢？事情要从六年前说起。

一九四一年，我是一门四十毫米波福斯高射炮的炮手组人员之一。我们的驻地是个沼泽，却美其名曰泽西草地，我们的任务是防卫威斯汀豪斯和通用电气两家公司的厂房，免遭德国轰炸机的空袭。我们一共约十几个人，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值班，每值班二小时，就休息四小时，等待

空袭的来临，考虑到我们的瞄准技术，空袭幸而从没有来过。

尽管有不少耗子和蚊子作伴，这个工作也很寂寞。烟雾不是太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帝国大厦和纽约的摩天楼。另一个提醒我们身处现代文明之中的事物是随着微风飘来的著名的西考克斯宰猪场的芳香。

这时，有消息传来说制定了一个陆军专门训练计划。穿着军装的服役人员将被送到大学里去学外语以备日后派遣出国之用。

为什么不去呢？我在中学和大学里学过几年法语，至少这可以把我从沼泽中救出来。我递了申请。

几星期以后，我被送到了纽约的市立学院，那是该军区的陆军专门训练计划的测验站。

我的法语已经忘了不少，但是总算勉强过了笔试关。接下来是口试。我说法语的能力几乎等于零，但是军队中小道消息的传播一向是效率挺高的，我们都很快知道了口试的方式。“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里人？战前你在干什么？……”我照此准备不误。

我的试官是市立学院的一位老教授，法国人。果然，他提出了老一套的问题。我对答如流，我的

佛莱特布什① 口音无懈可击。

“你在战前是干什么的?”

“是个律师，先生。”

他很有兴趣地看我一眼，就改用英语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在法国也是当律师的。“那么你对古德兄弟公司有什么看法?”

古德兄弟公司是纽约最大的一家法国人开的法律事务所。我刚好在报上看到过。他们是法国维希政府的代理律师。我尽管有点感到莫名其妙，还是给了一个坦率的回答。

“我觉得他们太臭。”

那位老教授眼睛一亮。原来我们两人看法完全一致。不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古德兄弟公司毁了他的一生。四十年前他在纽约登岸，梦想作为一个法国律师发笔大财，他向古德兄弟公司申请求职。由于他不是富家出身，不能带来有钱的主顾，他们就谢绝了他。他不得不改行教法语，这是他最厌恶的职业。一切皆是古德兄弟公司所造成。他从来没有原谅过他们。

我说的话正中他的下怀。因此他和蔼地微笑着，让我过了口试关。

---

① 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

看来没有什么问题，我不久就要重新学习法语了。我放了心。

谁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最后还需要站到由一批陆军军官和大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面前，听他们正式宣布你的专业。几天以后，我穿戴整齐，潇洒地立正在委员会面前。

他们告诉我已通过了法语测验。但是他们说，他们用不着那么多的法语学生。我愿不愿意学习汉语？

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象一条鳕鱼一样。

一位少校软语轻言地插进来。

“你住在纽约市吧？”

“是的，先生。”

“那么，尽管我不得随便向你泄露具体情况，我还是可以告诉你这一点——我们要送你去学习的学校是在纽约州。你可以常常回家。”

我仍有点犹豫。汉语？我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位少校又加一把劲。

“这学校是男女同校的！”

“我同意！”

第二个星期我就到了康奈尔大学，住在一所公共宿舍里，那里的地下室有个供应齐全的酒吧间。当时是在战时，男学生几乎都走空了。女学

生看到我们似乎很高兴。

九个月以后，我们就结了业。我们可以进行简单的会话，稍能阅读，但是几乎一点也不会写。我们还学了一些中国历史、地理和时事。从美国陆军标准来看，这已可以使我们成为专家了。我们一有可能就上中国餐馆去，练习使用筷子。我们认为已经作好出发的准备了。

但是，不是我们所能左右的力量又起了作用。原来传说盟军要在中国登陆——其实未必认真考虑过——的事已取消了，因此也就不再需要汉语译员。

那么怎么处理我们呢？陆军花了许多钱在六、七个大学里训练汉语译员。五角大楼里的一些智囊人物灵机一动，作了一个聪明万分的决定——让我们去翻译日语，不是普通的日语，而是日语密码。中日两种语言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一点根本没有人考虑到。

在一所训练破译密码的学校里学了几个星期的速成课程，略为碰一下日语语法以后，我们就给送到了设在檀香山的中太平洋司令部。

在这以后的六个月内，一直到战争结束，我们都在破译不太重要的截获对话，大部分是日本飞行员和他们的地面指挥塔之间关于气候状况的。

这是陆军无效劳动的又一事例，人人都感到无聊之极。

为了找些事情做做，而且也是因为有兴趣，我们有几个人在工作之余到夏威夷大学汉语班旁听。我们在排队等吃饭的时候，在上班时间内值班军官不在场的时候，就学习和练习。这时候我已真的给汉语迷住了。

一九四六年底我复员回纽约。我原来是个律师，同我父亲合伙开个法律事务所，但他已在战时亡故，我没有钱在派拉蒙大楼维持我们的办公室，但我又不愿为任何哪家大法律事务所工作。

按照士兵法案，退伍军人可以大致按他在部队中服役的年限，公费上大学，外加生活补助。我决定在还没有打定主意这一辈子干什么之前，利用一部分这样的时间学习汉语。我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只选了汉语课。我在那里学习了两个学期，然后转学到耶鲁大学，又学了一个学期。

在耶鲁大学的时候，我同朱利安·舒曼同屋，他是我在夏威夷认识的。他曾在哈佛大学根据陆军专门训练计划学习汉语，同我一样，也成了日语密码破译员。朱利安是纽约人，二十刚出头，而我则已年过三十了。

在耶鲁大学长春藤攀墙的校园里过过悠闲的

生活固然不错，但是我不能无限期地当学生。我能够使我如此着迷的汉语用在什么方面呢？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时结识了一些中国学生，他们建议我到中国去。他们说一个能说汉语的美国律师肯定很吃得开。

我不是那么有把握，但是这个主意吸引了我。我还没有结婚。我的母亲有工作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我对于一般律师不能摆脱的那种争名夺利、明争暗斗的处境感到厌烦。商业法是我熟悉的唯一领域，但是我希望在迷人的东方，做生意可能不一样些。尽管有一定的风险，我还是不怕。在不景气的年代里，我曾经扒过货车旅行，至今仍有冒险的劲头。

我的全部财产只有五百美元——那是我的复员费。我花了三百元买了一张船票，搭一条从纽约经过巴拿马运河开到上海去的小货船，船上有四个旅客舱位。我在动身以前所能拉到的生意是两个小出口商，他们给了我一些陆军剩余服装的样品，答应我如果能卖掉什么就给我一定的佣金。另外我同《剧艺》杂志联系好为它写些关于中国影剧方面的报道。我后来没有给《剧艺》写过一个字，不过在我自己的衣服破旧了以后那些衣服倒頗有用处。

朱利安·舒曼说，他可能以后来同我会合，一切要看我的遭遇而定。我答应母亲，如果我找不到出路马上就回来。

谁知道我要在二十五年以后才能再见到纽约。

我们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初的一个阴沉的日子启航。同我合住一舱的是个加拿大天主教会的法裔神父，他的教会在华北有许多传教点，他就是前往其中的一处。他不会说英语，但是为了怕“晕船”，他带了好多瓶好白兰地酒，十分殷勤好客，我们两人很快就成了酒友，喝得很欢，如果不是谈得很欢的话。

另外两个客舱的旅客是一对年轻夫妇，做妻子的已经有了好几个月的身孕了。丈夫战时随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南呆过，发现中国人没有牛奶喝。他就要到福建省的什么地方去办一个牛奶场，发一笔大财。他不知道——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牛奶从来不是中国人饮食的一部分。他们好几百年来没有喝牛奶照样活得好好的，他们喝的是一种用豆粉调制的豆浆，做起来简单得多，营养几乎同样丰富。尽管他的计划极不实际，但是他显然已经被中国的魅力所迷住了，他热情洋溢地向我描绘了南方的秀丽景色，对于振作我的

精神很有帮助。

因为我需要有人鼓舞我的精神，自从船一经过卡罗来纳州沿海的哈特勒斯角以后，我就晕船。有一句关于晕船的话是什么？“起先你怕你要死了，后来你怕你死不了。”

奇怪的是，从巴拿马运河起，我的晕船毛病好了。我开始有心情欣赏海的绮丽，它的蓝、灰、绿色泽的变化。我们看到了海豚和鲸鱼。我们曾经驶近一条巨大的母鲸和她的幼鲸，它们浮游在那里仿佛在安详地沉思一样，毫不为环境所动。

我们在檀香山停了一天，我上岸逛了一圈。色彩鲜艳，花香扑鼻。比起两年前满街尽是成千上万穿军装的人那种光景，现在看上去要干净和宽敞多了。

我们开始了最后一段航程。我带的收音机里可以清晰地收听到中国的电台了。我能够听懂不少，十分兴奋。

到了那里以后我该怎么办呢？我的思想并不明确。我的口袋中有大约二百美元，行李袋里是满满的一袋陆军剩余服装的样品，一些留美中国学生给他们上海家中的几封信和礼物，几件自己的东西，就此而已。

我想头一步要做的还是提高我的汉语水平，